

九四、九八台北雙城記： 不確定中大眾選擇的分流點

徐永明*

- 一、前言
- 二、問題意識—多數決民主制度中「少數」政治的形成
- 三、「少數」族群政治理論與其假設
- 四、模型的描述、命題的建立與現實意涵的討論
- 五、不確定中政治支持的難題
- 六、結論—「身份」政治的議程

本文透過兩次台北市長選舉的「策略性」投票行為研究，來討論少數群體（政黨與族群）在不確定情境下政治支持的決策機制，並探討表現在策略性投票背後的動機為何；進一步則探索「少數」政治行動的理性基礎。透過個體模型的建立與驗證，本文發現菁英特質與主流政黨的分合牽動了大眾的個別選擇，也整合（coordinate）了群體政治支持的方向。

關鍵字：策略投票、族群政治、不確定性、集體選擇

* 中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東吳政治學報/2001/第十二期/頁 75-112

一、前 言

四年前，陳水扁於九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中，以未過半數的票數險勝國民黨與新黨的候選人，而四年後，尋求連任的陳卻在罕見的高施政滿意度下，以與四年前相近的票數落敗。選後，許多政治人物與政論家多以傳統族群政治的觀點解釋陳的落敗（外省人不願支持陳水扁），或是強調李登輝「新台灣人」訴求所達到的跨族群整合作用（本省人願意支持馬英九）。在這樣的反省下，一個相近的結論是：陳水扁諸多選戰的策略及整個競選的過程可被批評為省籍意識的動員失敗，無法鞏固本省票源，並造成排斥外省族群。

本文則嘗試透過兩次市長選舉的「策略性」投票行為，來討論少數群體（政黨與族群）在多數民主體制的政治支持動機，以及表現在策略性投票背後的理性計算為何，更進一步探索「少數」政治行動的理性基礎。為什麼在多數決民主體制下，一個穩定的少數政治行動能夠持續？在何種條件下，少數政治願與多數合作？而什麼條件下則不然。其放置於現實的政治思考上，在多數決民主的設計下，對國民黨、民進黨兩個本省菁英領導的主流政黨而言，如何吸引外省族群的支持成為政權歸屬的決定性因素，因此討論兩個政黨本身的族群結構及與外省族群的互動，成為現實政治運作上所必須注意的重點。而台北市長選舉之所以成為「少數政治」的分析對象，除了因為外省族群在選票中的顯著比例，大到不能以邊緣團體視之；更值得注意的是，外省族群在台北市的動員條件：外省人聚居最密集的区域，其所衍生的社區網絡、文化資本的密集、與傳播工具的擁有，在在使台北市的選舉成為少數族群政治觀察的絕佳素材。而需說明的是，即便外省族群在台北市的比例並不算低，但與以本省閩南人為主要族群結構的國民黨和民進黨來說，也就是以族群的角度而言，外省人仍為少數，因此本文所針對的焦點--「少數政治」，即是針對族群而言；進一步而言，以政黨結構來討論，新黨中的外省族群比例在台灣主要政黨中為最高，因此本文假定外省族群中，認同新黨的比例為最高，

而在文中將新黨作為外省族群政治上的代言人。

二、問題意識—多數民主制度中「少數」 政治的形成

目前台灣族群政治或是認同政治研究的重點似乎集中在“台灣人認同”或“本省人意識”的起源（張茂桂，1993，1997；吳乃德，1993）、政治過程（王甫昌，1998）、意識形態內容（吳乃德，1996）與演化的途徑（徐永明、范雲，1998）。部分文獻雖然提及外省族群的認同動員、政治危機意識（徐永明、范雲，1994）以及其中國人認同的鬆動與變遷（吳乃德、沈筱綺，1996），但是一個完整的“少數”族群政治理論似乎仍未見基本的形體，尤其在現實政治的分析中，菁英省籍身份的衝突是政治時論的基本觀點，群眾政治支持的分析也大都延續著這個基調，假設著族群身分在分析中的主宰地位。

但是在直觀的反省下，我們不禁會問到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為什麼“少數”身份的認同會成立或存在？面對“多數”存在的情形下，“少數”群體身份的社會基礎與政治機制為何？為什麼外省人認同的政治表現如此地穩固而具集體性。當然相對的問題是，為什麼本省人的政治支持是如此地分歧與不穩定？這些問題有待下一個研究來回答，這裡我們關心的是“少數”群體的成員為何願意維持其“少數”的地位？（也就是說，在台灣族群結構中為“少數”的外省族群，為何願意維持在政治上亦為“少數”的地位？）或是更進一步地探討，“少數”為何會拒絕與“多數”融合，或進而採取對抗的姿態？（這些“少數”的外省族群為何會拒絕與“多數”的本省人有著政治上的融合，進而採取對抗的姿態？）當然，接續問題是少數與多數的融合如何可能？換句話說，在選舉競爭的制度條件下，“少數”族群的政治支持何時是與“多數”族群政黨分裂，而在怎樣的政治條件下，“少數”族群願意放棄其政治代表或“少數”政黨，轉而支持“多數”或主流政黨的政治代表？放在台

灣的條件下，外省人的政治支持是如何地轉移？什麼條件下會與“多數”政黨相分離（例如新黨從國民黨出走，進而在選舉中與國民黨採取對抗的姿態），什麼機制下願意相合作，甚至是以犧牲其少數政治代表與政黨的代價下進行（例如 98 年北市長棄王保馬的效應）。

從菁英與群眾的聯繫角度來看，同樣政治支持的問題，可以從兩者的互動關係來看：在怎樣的條件下，少數政黨（新黨）能獲得“少數”群體（外省族群）的政治支持？有哪些動機與計算驅使少數菁英進行政治動員，並進一步地與“多數”群體進行衝突？然而，在怎樣的機會結構下，少數菁英願意與“多數”妥協，並進而容許其少數政治支持流向主流政黨的候選人？換句話說，在怎樣的條件下，“少數”族群的政治效忠得以維持，在怎樣的機會結構下，“少數”族群的政治效忠會被衝擊，並轉換其政治支持。因此放置於台灣的現實政治，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很明顯，即在於外省族群成員（本文將只指涉為認同新黨者）在何種情況下會支持具有外省族群色彩的候選人，而與國民黨或民進黨採取對抗的姿態；而在何種情況下又會出現所謂的「棄保效應」，使得認同新黨的選民不支持新黨所推出的候選人，卻反而支持國民黨或民進黨所推出的候選人？本文以為，94 年及 98 年台北市長選舉的新黨支持對比，即是回答本文問題的最佳例證。

三、「少數」族群政治理論與其假設

爲了回答上述關於“少數”政治形成與變遷的相關問題，並提供一個可理解與預測的理論架構，我們從關於族群政治的基本假設出發，根據個人行爲、菁英與群眾互動的假設，我們嘗試建構相關的「少數政治支持」的行爲命題。在這樣的理論關懷下，本文進一步以少數政治支持的效用模型建構來作爲統計模型與實證驗證的基礎。

首先異於傳統族群文獻的共識--從族群身份與社區連帶出發，以解釋個人的政治行動，認爲個人的政治行動是由於認同其族群身分使然，（假設一）

是一個簡單的理性抉擇的詮釋。也就是說，族群身份的政治作用並非是出於利群的（我群的）或是情感上愛國心的驅動，而少數群體的政治團結常是出於個人自利的動機。尤其從融合的觀點來觀察（Laitin, 1992），在“少數”與“邊緣”群體的存在，且維持與多數群體的對立下，看似不理性的“少數”政治身份的彰顯，常是出於個人與群體互動下的自利計算。這邊的互動有兩個層面，一是個人與所屬的“少數”群體成員的互動，另一層面為“少數”群體與“多數”群體的互動。

而從群體與精英的立場--從個人出發，透過對於該族群政治人物的支持，一個團結的少數常能迫使多數群體採取較包容的公共政策，或是進而爭取政治位置。另一方面，從菁英的利益計算出發，少數族群菁英有強烈的動機維持少數的政治團結，以作為與多數菁英在政治位置與利益交換談判的基礎。對於少數族群內的菁英，她（他）必須與群眾建立一個合作的關係，甚至需與同族群的菁英來競爭這個關係，因此如何在多數民主體制中達成這一個合作的關係是本文關懷的重點。尤其是面對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壓力下，新黨群眾與菁英內部的團結，以及菁英與群眾之間的互動成為本文分析兩次台北市長選舉的主要架構。因為在 94 年的選舉，趙少康為新黨的候選人，可以說新黨的精英和群眾在 94 年選舉時都是十分團結的；而以 98 年選舉來看，照理說新黨應為外省族群在政治上“少數”的代表，但當時外省族群卻有兩位候選人，一位為新黨的王建，另一位卻是代表國民黨的馬英九，因此在 98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外省族群的菁英產生分裂，而選舉結果顯示外省族群的群眾也在選舉中作出分裂的選擇，新黨原來是代表外省族群的政治圖騰，卻在族群精英分裂的情況下喪失其作為外省族群政治圖騰的支持與意義。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對“多數”群體而言，當顯著的少數團結時，如何爭取“少數”的支持，成為決定政治權力歸屬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為，適當的理論架構要能回應這些挑戰，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來理解兩次台北市長的選舉，以及其對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意涵。

因此本文討論的焦點，是在選舉競爭的不確定性環境下，少數族群對於

選舉結果與政治後果的預期，往往決定了其政治行動的方向。一般策略性投票與理性預期的文獻通常是，以預期與偏好的衝突來解釋策略性投票的動機（Downs, 1957）。這裡我們則從少數政治集體行動的個人機制來討論，也就是在個人是理性自利的假設下，少數之成爲少數政治，是一個與多數協商的槓桿（leverage）；也就是說，以與多數協商爲目的，少數得以維持其少數的身分。爲了解釋這個集體的現象，我們從三個簡單的個人行爲假設出發，嘗試提供一個個體層次的族群政治理論。

（假設一）：個人的團體忠誠源於自利。

托克維爾曾對「自利」有中肯而獨到的理解，在*Self-Interest Rightly Understood*一章中，他闡述：「自利的原則無法產生自我犧牲的偉大行爲……但它卻使許多人培養出規律、中庸、謙虛、有遠見、能自制等習慣；如果自利無法導引人們有意地去達成美德，它也能藉由習慣而逐漸將人導向正確的方向。」（Tocqueville, 1969:129）¹。他的觀察提醒我們「自利」對於個人行動的約束面向，以及許多人對於「自利」與「認同」對立的誤解，主張認同是在自利的對立面，強調認同行爲中自我犧牲與利他的面向，以對照於自利（self-interest）的「自私」（selfish）面向。於是認同上升到政治道德的層次，超越了一般政治行爲的內涵。

本文則強調團體忠誠與認同的個人自利面向，尤其是個人前景與團體「命運」連繫的建立，沒有這個機制的存在，個人的認同缺乏堅實的基礎。一般關於這個「命運共同體」的討論雖然隱含一個自利的假設，但強調的是一個以靜態的關係爲主的分析架構。在這個分析傳統下，團體與個人的互動機制變得不重要了，不是個人的身份繼承成就團體認同，就是團體行爲的描述取代了個人行爲的分析。相反地，本文的自利（假設一）隱喻著，個人對團體

1. 中文翻譯摘自鄒繼礎所譯，Gary Becker 的《解讀偏好》（*Accounting for Tastes*, 199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第24頁，台北，遠流出版社。

的合作並非必然需要個人去犧牲一些自己的利益，尤其是成員認知到當團體的行動達成與否將影響個人利益（payoff）的回收時，團體本身的存在及活動的確牽動了個人的效忠動機。下面（假設二）即討論了個人態度變遷的基本動機。

（假設二）：自利的計算是未來取向的。

（假設二）則認為，自利計算並非是對當下結果的反省，更多的時候是對未來的預想與反應，當預想的未來是穩定、預料中的，個人就沒有動機去更動既有的選擇。但是當原本自利的計算架構有了更動時，不確定的未來似乎遷動既有的利益計算、習慣的形成、與忠誠的維持。就如 Schelling (1978：95-97) 所討論的 critical mass 現象，亦即個人對於群體其它成員可能動向的“預期”，往往會影響其個人政治支持的計算。根據這個「向前看」的理性，我們衍生出（假設三），團體忠誠行為的主要考量在於其他成員的行動意向。

（假設三）：對未來處境的預期受同一群體成員行動的影響。

政治支持的決策是以個人為基礎，但是其政治支持的回收則是取決於其它成員的行動。這樣透過個人的自利來建立個人行動與該群體的維繫，族群政治的集體面向的機制（mechanism）才有清楚的釐清。少數政治的成立在於這個機制的有效運作，而其中重要的關鍵在於群體行動對於個人利害的影響。例如在文化融合的面向，台灣原住民對於漢文化的學習常是提升社經地位的有效途徑，在菁英甄拔的層面更是如此，因而原住民文化的維繫並不存在一個自利的機制，反而是在多數漢化的趨勢下，少數身份的傳承受受到更大的衝擊。

相反地，在兩次台北市長的選舉競爭過程中，外省群體的集體行動則是

異常的顯著。尤其不論是趙少康落敗的九四年選舉，還是馬英九險勝的九八年，沒有任何政治觀察家會忽略選舉中，外省族群的集體行動表現。無論菁英或輸或贏，外省群體的利益與認同是任何政策制定者所不會忽視的。在這個情況下，個人政治支持的回收是因為團體的行動形成而得到加強，個人在政治支持的「背離」動機也就越缺乏基礎了。

四、模型的描述、命題的建立與現實意涵的討論

4.1 團體成員的效用預期

在上面三個個人行為假設的基礎上，少數群體的成員是面對一個 Binary Choice Game 來決定其對團體忠誠的維持與變遷 (Shelling, 1978: 213-43)。如圖一所示的，橫軸代表群體中的成員選擇背離 (defection) 的數量，兩條斜線代表在兩個策略選擇中，背離團體的成員在數量的變化 (橫軸) 如何影響兩個策略效用 (payoff) 的變化 (縱軸)。意思是說，當選擇背離的成員數量越來越多的時候 (在橫軸上逐漸往右移)，身為團體中的一員，面對團體中背離者的增加，而自身欲作選擇時，考量背離或效忠兩個策略時，發現效忠和背離兩個策略的效用，隨著背離者的增加，則選擇背離的策略對自己越有利。其中兩個斜線的交會點對應於橫軸的 k 點，代表--當選擇背離選項的族群成員數量達到這個規模時，背離的效用將會超過效忠的效用。相對地，在背離的成員數量達到 k 點之前，效忠的效用仍高於背離選項，因此 k 點代表著少數集體行動的「分流點」。而圖一所代表的即是團體中背離者的數量，影響團體成員對於效忠或背離的預期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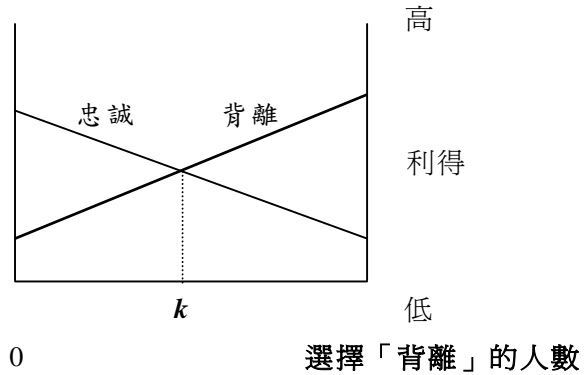
David Laitin (1995) 評論這個模型不僅能連繫個人的考量與集體的行動，並強調其對集體行動形成的描述，符合族群政治的幾個特性。第一是**溜滑梯現象**，透過世代的接替與長時期的互動，族群身份的揚棄 (也就是對於

所屬族群的背離) 如一個溜滑梯的過程，背離者是逐漸增加，而不會逐漸減少。第二個是**集體行動中的囚犯難題**，圖一很清楚地顯示有兩個均衡點各是在橫軸的兩個極端，也就是當均衡的達成是在任一極端時（沒有人背離，或所有人都背離），參與的成員可能會覺得另一均衡的回收較高，但因為身處於其中一個均衡點中，考量其他成員的選擇時，發現自己並無動機獨自行動，採取另一個相對的策略。因此在所有人都忠誠，或所有人都背離的情況下，個人並無動機往另一均衡點移動。這個結構解釋為何認同身份的穩定性，甚至被視為是“固定的”社會分歧。它的反面意涵是，當世代交替之後，認同身份已普遍被揚棄時，要號召復興亦有其集體行動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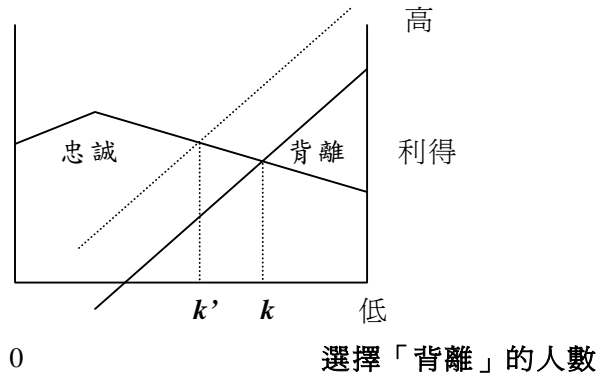
圖一及圖二的分別在於，兩圖中達到「少數選擇分流點」 k ，所必須經歷的效用選擇結構並不相同。透過對「少數選擇分流點」 k 行為的討論，我們可以理解為何某些族群的政治行動較為顯著，而有些則較為模糊，分析其結構上的限制，為何 k 點行為將會決定族群集體行動的特質。例如圖一與圖二中「分流點」 k 的行為決定了截然不同的族群政治現象²，在圖一中，透過群體中部份成員（如年輕世代）的集體行動，就能降低背離的成本，並增加其它成員效法的回收。但是在圖二中，若背離者為少數，後果是相當嚴重的，並且必須在達到相當數量的集體背離的條件下， k 點才會被達成，而其背離所產出的效用才會大於效忠的效用。在這樣的動員結構下，族群政治的凝聚力將是非常穩固的。

2. Laitain (1995) 據此來解釋為何會有「邊陲」族群的持續。對他而言，「邊陲」(Marginality) 與「少數」(Minority) 是截然不同的現象，而本文則不認為兩者本質上有何深刻的差異，而是視兩者的區分僅在族群動員的差異程度。例如在圖一中，所描述的是一個不穩定的，「少數」的政治現象。反之，圖二所描述的是，一個穩定的「邊陲」團體之政治現象。

圖一、團體忠誠的維持
(分流點 k 較易達成)



圖二、團體忠誠的維持
(分流點 k 較難達成)



因此接下來的討論是，究竟什麼因素在影響「少數選擇分流點」 k 值的行為，而更重要的是，族群成員如何理解或預測 k 值的行為。這裡並不是說，行為者本身有一個清楚而自覺的概念，或清楚理解 k 值的意義，而是透過 k 值的行為來標示成員的趨勢預期，並假設她（他）會根據這個預期來進行政治支持的決策。當成員覺得「分流點」 k 值是遠在橫軸的右端時，個人預期集體行動的成效，乃至於個人的努力都會是相當保守的。相對地，當成員預

期 k 值是在橫軸的左端時，成員移動的動機與機會均會不同於圖二中的行爲。

4.2 命題的建立

根據上述連繫個人動機與團體行動的圖形模擬，透過對於「分流點」 k 值行爲的討論，我們可以發展出以下關於族群政治行爲的通則，以作為發展少數族群政治理論的基礎。

（命題一）：族群身份的演化一旦發動，是一個一去不復返的過程。

這個命題是描述一個長期的「溜滑梯現象」，即少數與多數兩個群體間的互動過程，透過個人理性的學習，將會改變其團體認同與政治效忠，因此經過時間的遞移與世代的交替，群體中揚棄族群身分的成員漸多，在現實層面的意義上是有利於政治融合的。對於這個均衡替代（lock-in）與發展路徑競爭的動態過程，徐永明與范雲（1998）「學作台灣人」一文有清楚的界定與實證的測量--透過「中國人」、「台灣人」認同的選擇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過去，選擇「台灣人」的比例漸多，顯示跨世代的替換的確是一個穩定，而方向明確的過程。但是這個過程的發動機制為何？則是以下的行爲假設所必須界定的。

（命題二）：少數政治穩固與變遷的機制在於到達 k 值的容易與否。

這個命題是建基在 k 值連繫個人自利與團體命運的動態過程。如前面兩個圖型所呈現的， k 值代表個人對於團體效忠的效用取決於成員的行動，而其他成員的抉擇則又取決於其他成員的意向與行動。很清楚地，在圖二中，叛離的行爲是受到嚴厲的處罰，表現為與效忠行爲有極大差距的效用（payoff）。尤其當少數背離情形出現時，圖二甚至有「負」的效用，表示透過忠誠的獎勵與背離的懲罰，加大了達到「分流點」 k 門檻的距離與代價，這解釋了為何不同的族群團體（如台灣的外省人與客家人）其族群政治的表現形式有很大的差異。透過這個個人動機與團體行爲的連繫，我們發現其解

釋的架構是一致的，重點在於到達「少數選擇分流點」 k 行爲的性質，或是說影響 k 點行爲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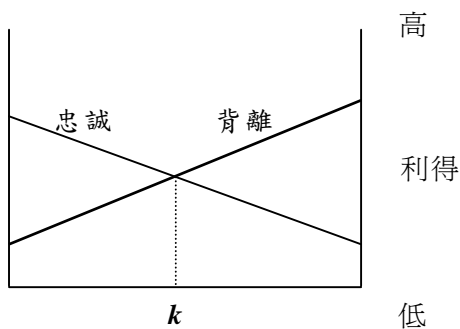
本文接下來要探討的是，「分流點」 k 值的大眾預期是如何達成的。我們認為 k 值“預期”的形成與資訊的來源，常表現為族群菁英的合作與競爭。族群菁英的團結與否，對於族群成員的自利計算有兩個面向的影響—第一個面向為族群中群眾及菁英的互動，表現在對於其他成員意向的預期，以及對於政治團結回饋的預期。在群體中菁英合作的情況，群眾較傾向預期其他成員的團結，以及提高對於政治團結所獲得的回饋；而在菁英分裂的情況下，群眾較不易預期其他成員的意向，因此個人的決策風險較不穩定，對於政治團結回饋的期望亦較低落。另一個面向則是多數族群對少數的整合努力，表現為少數菁英的提拔，或是政策的號召。

（命題三）：第三黨作為少數政治的表現形式，取決於主流政黨的回應。

（命題二）討論的是少數政治的維繫，以及其政治強度（militancy）差異與消長的原因。（命題三）則是討論政治融合的拉力，或是政治供給這一個面向，也就是在怎樣的條件下，少數群體願意與多數政黨合作。這時候 k 值的行爲並非單方面地取決於少數政治的性格，而且是少數政治與多數政治的互動結果。再一次回到上面兩個圖形中，這時候圖形描述的不只是團體的效忠，而是代表少數政治支持與多數群體合作的結構，也就是當少數菁英（minority elite）有意願與多數政黨合作時，其政治基礎為何。此時，我們可以對圖形一與圖形二有不同的政治詮釋（見圖三與圖四），橫軸代表少數族群與主流政黨合作的程度，也就是背離少數族群而向主流靠攏的少數團體成員數量，而縱軸代表合作過程中成員的回收。如同圖一及圖二的解釋，以圖三為例，當少數群體中的成員越來越多向主流政黨靠攏時，其他成員預期對自身團體叛離的效用會大於對自身團體效忠的效用，而其「分流點」也在於 k 值。

圖三、少數與多數合作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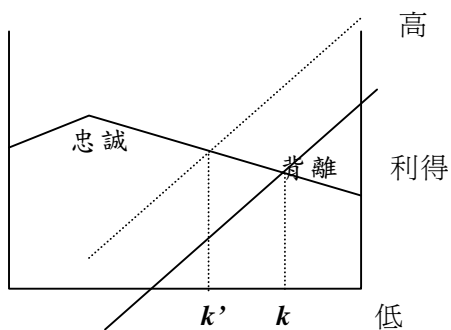
(分流點 k 較易達成)



0 少數團體中成員與多數合作的數量
(外省族群中成員與民進黨合作的數量)

圖四、少數與多數合作的程度

(分流點 k 較難達成)



0 少數團體中成員與多數合作的數量
(外省族群中成員與民進黨合作的數量)

4.3 民進黨的省籍難題

相較於圖四，圖三中之政治支持的移動顯然較為容易，可以代表國民黨與外省族群合作的條件。反之，圖四代表外省族群與民進黨合作的結構，不單是 k 點難於達到，初期合作者所遇到的懲罰也是相當明顯的。這兩個圖型描述了外省族群與兩個本省族群領導的主流政黨間的政治合作結構，也就是當族群菁英面對這兩個政治選項時，是選擇在不同的動員結構中進行群眾的政治說服。從主流政黨的角度來看，民進黨是在一個“不平等”的條件下與國民黨競爭外省族群的政治支持，例如當少數外省菁英參與民進黨所受到的壓力表現為圖二中低於橫軸的負回收。相較地，留在國民黨內的外省菁英是與脫離國民黨的菁英在競爭族群成員的支持，兩個外省菁英團體的政治前途顯然取決於連繫個人與外省團體的誘因結構，是如何地被群眾的集體行動所遷動，進而決定那一個均衡點的達成。作者認為外省族群與國民黨互動關係為圖三，民進黨與外省族群的互動關係為圖四，並假定民進黨與外省族群的合作進展不易的理由，在於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歷史分析。對於國民黨而言，國民黨以一個外來政權入主台灣，因此早期國民黨菁英以外省族群為重，而民進黨以一個在野對抗的反對勢力為前身，其一開始所訴諸的就是族群動員，這可由民進黨內普遍以閩南話為溝通以資佐證，因此，雖然李登輝力行國民黨的本土化而造成新黨出走，但兩個政黨對於外省族群的親疏遠近即可由此看出，因此在與外省族群的合作程度上，國民黨是較民進黨來的容易的；且在以外省族群的角度而言，則較傾向於認為民進黨比國民黨對待外省族群較有敵意。

根據上述討論，實際政治意涵在於兩個主流政黨的族群政策，以及各自在政策選項上的限制與自由度。對於民進黨而言，如何提高右端均衡點的收益，即徵拔外省菁英的努力，再者如何降低合作者的族群內壓力是不可推卸的。相對的，國民黨如何重用黨內的族群菁英，即會影響兩端均衡點的相對

吸引力，以及「分流點」 k 值的行爲。簡言之，對於外省族群團結的維繫而言，國民黨是最有影響力的（因為國民黨是外省族群較會考慮與其合作的對象）；而民進黨的省籍難題，表現爲新黨的團結與國民黨努力吸納的拉鋸戰中，民進黨毫無立足點，而國民黨與新黨彼此間的消長又無助於民進黨省籍困境的化解。

回到圖形四的行爲來討論，改善民進黨的省籍困境在於影響「少數選擇分流點」 k 值的行爲，可能的出路在於移動「背離」實線的行爲到虛線的位置，降低少數外省叛離者所需負擔的成本，以決定一個新的、易於達成的 k 值。其現實的政治意涵是新的菁英政策，不但需提升黨內外省菁英的決策與代表地位，更需廣泛地增加與外省族群的互動，主動地承擔接觸瞭解的成本，而非如九八年敗選後，以政治認同質疑外省族群的政治支持，將自己視爲「受害者」（the victimized）。無法瞭解自身困境的民進黨菁英，會發現自己不斷地在一個「動員」與「反動員」的漩渦中，不但加深族群鴻溝，也使執政困難，民政鞏固的不確定性大。

4.4 第三黨的性質

對於新黨作爲兩個主流政黨之外之“第三黨”的性質與社會基礎有許多的討論，它是作爲一個常態的、擁有廣泛而穩定社會支持的政黨，還只是一個不穩定的、“抗議性的”而受制於主流政黨回應的暫時現象。Rosenstone (1992) 對於美國第三黨現象的分析傾向於後者，強調第三黨的政治基礎在於主流政黨在重要議題上疏離的選民（estranged voters），因此在主流政黨調整其政策重點或是立場時，第三黨就會面臨到生存空間的擠壓。至於台灣「新黨」現象的討論則顯然有不同的看法，除了傳統的族群衝突的解釋外，新興社會分歧的出現，以及統獨議題的演化都是相當重要的解釋（Chu and Lin, 1996；Chen and Hsu, 1996）。

在本文的解釋架構下，第三黨的性質取決於主流政黨對於外省族群的互

動關係，或者說 k 值的行為決定了第三黨政治支持的穩固與社會基礎的性質。從這個動態的角度來看，所謂以社會分歧與疏離選民來解釋第三黨的維繫，其機制在於前面圖四與圖三的差異。當轉移政治支持是如圖四般困難時，第三黨的政治就會相當地穩定（對於第三黨成員來說，叛離的成本較高）；但是在圖三的條件下，第三黨的不穩定性與工具性則是相當的明顯，因為第三黨的成員有較高的誘因和主流政黨合作。有趣的是，如前面所討論的新黨（或外省族群）與其它兩個主流政黨的關係是各自表現為圖三（與國民黨）與圖四（與民進黨）的處境。因此新黨的性質的確取決於國民黨對於外省菁英的爭取，其間民進黨扮演的角色有限。

4.5 少數政治是理性個人的異例？

所謂“少數”族群政治，代表著一個異於主流或多數族群的集體行為，表現為少數族群身份的凸顯，以及與多數族群的對抗，例如對於政治合作，乃至文化融合的抗拒。前面個人行為的假設則強調這一個集體行動的個人計算面向，也就是族群身份對政治行動的影響並非是決定性的，其中個人理性的計算，以及對其他成員行動的預期才是主因。但是這一個典型的「理性抉擇」模型，直觀上無法解釋少數政治在多數民主體制下的存在，而傳統的群體認同，身份的主導性與歷史歸屬感才能解釋少數政治的存在，以及這個行為的穩定性。因此大部份民族主義的文獻往往會遺忘了個體理性的討論，並理直氣壯地直疑「自利的個人」怎可能組合成一個大我的民族認同。有趣的是，前面對於「少數選擇分流點」 k 值的討論提供了理性個人貢獻於集體的族群行動一個管道，當個人抉擇的計算基礎是取決於同族群成員的集體選擇時，集體的 formed 與否不單是一個感情認同的問題，更是個人的利害關係。而決定「分流點」 k 值行為的在於幾個因素：

4.5.1 少數與多數社經與文化地位差距的幅度

當少數群體在社經文化的地位也是居劣勢時， k 值是在一個易於達到區域，也就是少數群體有很強的動機去拋棄其身份與認同，例如投資學習多數族群的語言，並進而支持其政治菁英。尤其當這個差距越大時， k 值的達成也就越容易，少數政治的基礎也就越不穩定。從這個角度來看，放在台灣的情境下，我們會發現外省族群的政治性格是有其物質基礎的，由於經濟地位差距的不顯著，文化地位的優勢，加上長期控有國家機器，「少數選擇分流點」 k 值可預期地在困難達到的右端遠處。這或許可以解釋，在民主化過程中，外省族群的危機意識，或是第三黨的出現都是在放大這個少數群體的聲音（voice），可預期的未來，台灣政治的主要分析架構仍會是這個少數群體與主流政黨間的互動。但就長程而言，許多的政治措施，如國民黨的本土化與政治民主化不單削弱了外省菁英的實質優勢，其長期潛在的效果在於對於 k 值移動的影響。就如（命題一）所討論的，透過「分流點」 k 值的行為的調整以推進長期的融合效果。

4.5.2 菁英政治的性質與角色

在圖三、四中一個最明顯的「不理性」群體，在於初期願意容忍團體壓力的“背離者”，這些“背離者”通常來自群體中的邊陲成員，或是策略菁英的大膽行動。這裡的分析著重在政治菁英的策略選擇，因為唯有菁英方能忍受這個移動的成本，而菁英的功能更在於透過自身對於初期成本的負擔，來降低追隨者的成本，並說服追隨者參與的前景（Chong, 1991：1-7）。也就是當一般集體行動的文獻並不區分菁英與群眾在利益結構與認知上的差異，或是純就「選擇性誘因」來解釋小型的集體行動時（Olson, 1965），本文的族群政治模型強調菁英所扮演的「啓蒙角色」，在於承擔初期行動的成本，改變群眾對於 k 值的認知，甚或改變動員的結構（即圖三、四的差異）。

另一方面，對少數族群菁英而言，其與主流政黨或是多數族群菁英談判的籌碼，在於少數族群的團結。不論是在文化學習、認同與政治支持方面，

唯有顯著的「少數」地位，少數菁英才得以獲得多數群體的認可，以取得相應，乃至更高的政治地位與利益。因此少數團體中的菁英有異於群眾的政治動機，使得族群的「群內察舉」(inner policing) 成為嚇阻背離者的重要機制，尤其當群體內的網絡互動、職業分佈與文化認同越密集，「群內察舉」作為維繫族群團結的效果也就越重要。這個機制解釋了圖四初階段高壓情形存在的原因，沒有這個內部監督與糾正的機制，很難解釋為何與多數族群的合作會導致高成本的懲罰。

但是前面「群內察舉」成立的前提在於族群菁英的團結(如圖四所示)，圖三代表的則是在族群菁英分歧衝突的情形下，不但是有菁英願意負荷初期的成本，更重要的是「群內察舉」的失效所導致的「少數選擇分流點」 k 值的趨中行爲。在這樣的衝突過程中，族群團結的效果不但被削弱，少數政治被整合到主流政黨的趨勢有了堅實的個人動機。在新條件形成下，不同族群在認同與政治支持合作的基礎才得以存在。

討論至此，族群政治作為一個集體行動的現象，標示著如何整合大眾政治支持的重要性，而集體的大眾政治支持在本文具體化為選票的凝聚與移動。也就是在選舉競爭過程中，如何表現出族群政治的集體性，成為族群菁英的重要課題。“少數”族群政治表現為對於“融合”行爲的抗拒，作為一個集體行動以維護族群身份的完整性與作為“少數”身份的利益。這個“少數”族群身份的凸顯成為菁英號召群眾的動員機制。對於少數族群菁英而言，對於“少數”身份的強調與融合的抗拒，在於其自身在主流或多數族群的政治體制中政治地位與利益的剝奪，或是對於其在“少數”族群中作為政治代表政治利益的前景。兩者各作為推力與拉力促進了“少數”菁英進行政治動員的動機。

五、不確定中政治支持的難題

透過上面的模型描述與命題建構，我們有了一個一致性的架構來分析比較九四與九八年兩次台北市長選舉。對於九四年，少數族群政治的性質表現為族群間菁英的對抗，以及多數族群的策略性投票。至於九八年，少數族群政治性質的變化表現為外省菁英間的競爭，與主流政黨的吸納。也就是說在九四年，外省菁英的團結表現為新黨的崛起，因而外省族群的動員結構表現為圖四的「對抗」模型。而且無論是對於主流政黨中的國民黨或民進黨而言，外省族群的對抗性質是一致的。相對的，九八年的外省菁英是在競爭的處境中，尤其是分處於主流政黨（國民黨）與第三黨（新黨）中，因而圖三的模型較適於用來描述新黨支持者的決策處境。因為菁英的分歧導致族群內「群內察舉」的減弱，表現為「分流點」 k 值的趨中，乃至到後期王建的弱勢表現， k 值乃迅速地往右端移動，代表與主流政黨合作成為新的均衡點。

去呈現上面所討論兩種策略處境（political scenario）的差異，表一根據兩次選後的訪談資料，以分裂投票的架構來呈現新黨選民的策略行動³。表中第一橫欄代表受訪者在市議員選舉的投票取向，以此代表其政黨支持的傾向。而在每一群政黨支持者中，第二橫欄再細分其選前對於個別候選人當選可能性的預期，因此我們會有個別受訪者的「政黨支持傾向」與「選舉預期」的資訊。第三個面向則是其最終的投票決策，表現為左邊橫欄的分組。透過這三種資訊，受訪者的政黨傾向、選舉預期（看好度）與投票決策，可以區分出那些受訪者的投票決策是與政黨傾向一致，那些是與選舉預期一致。在這樣的分類下，希望能初步描述兩次選舉選民的投票結構，以及其與前面兩個模型相符合之處。

在九四選舉中，國民黨的選民中多數認為陳水扁有較大的可能性會當

3. 兩次選後面訪的資料均來自胡佛教授所領導的「政治體系與變遷」工作室，其成員為陳德禹、黃秀端、梁雙蓮、陳明通、徐火炎、朱雲漢、林繼文、林佳龍與張佑宗，在此特別感謝。

選，表現在投票決策上，這群政黨傾向與選舉預期有分歧的受訪者中，分別有 46% 維持對於黃大洲的支持，41% 轉向支持陳水扁，而 14% 選擇支持趙少康，這個現象通俗稱之為「棄黃保陳」。反觀新黨的支持者，仍然是多數看好陳水扁會當選，但是在政黨支持與看好度分歧的群體中，有 76% 仍然維持其政黨忠誠，只有 21% 轉移選票到陳水扁。對於這個策略現象的討論，圖四的架構的解釋在於，外省菁英團結的情形下，兩個主流政黨顯然對於新黨支持者皆缺乏吸引力。⁴

表一、九四與九八年台北市長選舉的分裂投票

九四年

市議員政黨投票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黃大洲	陳水扁	趙少康	黃大洲	陳水扁	趙少康	黃大洲	陳水扁	趙少康
選舉預期									
市長投票決策									
黃大洲	47 (95.9%)	108 (45.8%)	7 (28.0%)	5 (55.6%)	8 (3.1%)	1 (11.1%)	2 (66.7%)	4 (3.2%)	2 (3.8%)
陳水扁	2 (4.0%)	96 (40.7%)	2 (8.0%)	4 (44.4%)	244 (95.7%)	8 (88.9%)	0 (0.0%)	26 (21.1%)	1 (1.9%)
趙少康	0 (0.0%)	32 (13.6%)	16 (64.0%)	0 (0.0%)	3 (1.2%)	0 (0.0%)	1 (33.3%)	93 (75.6%)	49 (94.2%)
N	49	236	25	9	255	9	3	123	52

4. 直觀地來看，會有人問為什麼不討論多數族群的政治支持？尤其在當下，決定總統大選的應是居多數的，本省族群的意向。作者的回答是，多數政治的分析架構與少數政治並不相同，加上總統選舉中國際因素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得討論更為複雜，須另為專文來處理。

九八年

市議員政黨投票	國民黨			民進黨			新 黨		
	馬英九	陳水扁	王建	馬英九	陳水扁	王建	馬英九	陳水扁	王建
選舉預期									
市長投票決策									
馬 英 九	186 (83.0%)	47 (41.2%)	0 (0.0%)	12 (17.4%)	10 (6.3%)	0 (0.0%)	85 (87.6%)	42 (65.6%)	0 (0.0%)
陳 水 扁	27 (12.1%)	64 (56.1%)	0 (0.0%)	56 (81.2%)	150 (93.8%)	0 (0.0%)	6 (6.2%)	11 (17.2%)	0 (0.0%)
王 建	1 (0.4%)	3 (2.6%)	1 (100.0%)	1 (1.4%)	0 (0.0%)	0 (0.0%)	6 (6.2%)	11 (17.2%)	0 (0.0%)
N	224	114	1	69	160	0	97	64	0

附註：資料來自胡佛所領導之「政治體系與變遷工作室」。

1. “選舉預期”測量的問題：在開票前，您原先預期誰最可能當選？（九四、九八年問卷皆同）
2. 括號內的百分比代表縱欄每一格的相對比值。
3. 表中的 N，為市議員支持新黨，且市長有參與投票（必須明確支持某一位候選人），並對於市長選舉加以預期的受訪者。

至於九八年則是另一個故事了，對於國民黨的支持者，三分之二預期黨的候選人馬英九會當選，而其餘的三分之一則看好陳水扁。在政黨傾向與選舉預期分歧的群體中，56% 的國民黨支持者轉向支持陳水扁，但仍有 41% 維持對馬英九的支持。這個分配看似與九四年差距不大，但重要的是更多的國民黨選民看好馬英九，且投票給馬英九。有趣的現象在於新黨的支持者，其中 60% 看好馬英九，而 40% 則預期陳水扁當選，無人看好新黨候選人王建。重要的是，無論是看好馬英九或是陳水扁，大部份新黨支持者皆投票支

持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對於新黨菁英而言，這個策略情勢顯然有別於九四年，其中重點在於對新黨候選人的忠誠並不成為支持者的最適策略。雖然在兩次選舉，新黨的候選人皆無法贏得選舉，但是其政治動員的結構則是完全相異的。相應於圖三的二八年選舉，與相應於圖四的九四年選舉， k 值行為決定了大眾最適策略的選擇，而菁英的競爭，尤其是少數菁英間的分合，所影響的大眾預期則是影響「少數選擇分流點」 k 值行為的重要因素。這或許才是九八年選舉的核心過程，國民黨內外外省菁英的競爭決定了主流政黨對新黨群眾吸納的能力。

接著的討論將專注於選民對於候選人的評價如何影響到其政治支持的移動，透過一個個人效用模型的建立，討論總體現象 k 值的移動如何表現為個人在政治支持決策過程中各種考慮衡量的結果。

5.1 族群政治的策略投票：「分流點」 k 值機制的辯認過程 (identification)

傳統的策略性投票文獻大多強調“選舉結果”這個面向的效用計算，如何在多位候選人競爭的不確定性中避免最壞的結果，以防止最不樂見候選人的當選。也就如 Downs (1957) 所說的，多位候選人單席次的競爭與兩位候選人單席次競爭的差異在於前者的不確定性，以及不確定性所衍生的“策略性”思考。在兩位候選人競爭的結構中，選舉的不確定性並不會與“策略性”投票相關連，選民因各種考量而投票給最喜愛或認同的候選人。相對的，多位候選人單一席次選舉中，選民為了避免最不喜歡的候選人的當選，有可能會投票給次喜歡的候選人，而非最認同的政治菁英。因為這樣策略思維所衍生的投票考量中，對於選舉結果的評估與政治認同的衝突就構成了一個“策略”情境迫使個人在多黨競爭的架構下進行選擇。

而本文在這裡所處理的不是一個均質的政黨體系，而是一個建基在多數、少數族群衝突的新興三黨體系，尤其是觀察少數群體或是第三黨在單一

選舉的多數決制度下，少數群體的支持者與成員是如何在進行投票決策的。比較了兩次選舉的面訪資料（參見表一），在候選人組合差異的條件下，我們觀察到了顯著的選民投票支持的移動。接著的問題是如何在這個個體行為上界定選民決策的機制，將選民決策的過程建立為一模型，這個個體模型將預測不同族群選民行為的特性，以及在個體層次的資料上討論其對總體行為的預期。嘗試去回答這些問題，建立一個可據以預測下次選舉的架構，基本上先需要 identify 一個個體層次的決策模型，而這時候前面三個個人行為的假設就提供了建構的基礎。

5.2 “少數”投票的理性與感性

假設一個新黨支持者在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的投票決策由相競爭的“效用”（utilities）考量所決定。第一個是認同的效用，以對政黨的認同傾向來決定其政治支持的對象，或換句話說，支持所認同的政黨的候選人，投票行為會對個人產生正面的效用與滿足感，也就是投票決策中「感性」的一面。儘管政治心理學的文獻傾向於以「認同」來解釋之間的連帶，但並未討論其「認同」的內涵，這裡以認同的效用感來解釋其影響力。第二個是對於其他人行為預期的「工具性效用」，例如對新黨的支持者而言，其它主流政黨的候選人--陳水扁與黃大洲的看好度，會影響該黨支持者投票的效用。因為當她（他）支持的候選人趙少康相對地不可能當選時，對政黨認同所衍生的投票效用會與選舉預期的效用相抵消。在一個 binary choice set 中當政黨認同所衍生的「表達性」效用（expressive utility）高於選舉預期所衍生的「工具性」效用（instrumental utility）時，我們預期這位新黨支持者會將選票投給新黨的候選人，無論其看好度如何。至於當「工具性」效用高於「表達性」效用時，我們預期這位新黨支持者會有很強的動機將選票投給其它主流政黨的候選人，例如國民黨的黃大洲。同樣的效用模型可以運用到其他政黨的支持者的決策分析上。

而這個兩種效用模型的區分法是衍生自前面關於個人政治決策的三個假設。首先，個人的「認同」是一個自利的習慣，因此我們界定因為認同的需求而衍生的「表達性」效用，當然是對個人的感受是正面的。再者，因為「自利」的個人是「向前看」的，所以對於選舉結果的預期會成為另一個「工具性」效用來修正其政治行動，尤其在不確定性高的政治競爭環境中，理性預期所衍生的「工具性」效用常會主導選票的移動，乃至候選人的成敗。這是為什麼「棄保效應」的討論是從專家學者到市井小民皆可朗朗上口的，但一般的研究似乎集中在統計測量，而缺乏一個一致的模型以作不同選舉情境的比較研究。至於第三個假設則是與一般的策略性投票理論不同，將個人行為的動機與團體成員的決策聯繫在一起，強調在團體動員的情境下個人行為的參考架構是關聯到其它成員的行為。

基於這個個人行為團體面向的影響，如前面對於理性預期的討論，「工具性」效用的部份在這裡擴張為對於菁英競爭性的評估，也就是將圖一、圖二中的 k 值界定為個人對主流政黨候選人競爭性的相對評估。其中簡化的邏輯是，當對立的多數族群菁英愈有機會贏得選舉時，少數族群的團結也就愈凝固， k 點也就愈難達到。相對的，當主流政黨中的少數菁英有機會取得勝利時，第三黨作為少數族群政治支持的象徵也就愈不穩定，表現為圖一中較易超越的「分流點」 k 。因此，「工具性」效用模型成為決定族群政治性質的重要過程。在這個新基點上，才有可能修正並挑戰傳統上由「身份」與「認同」所主導的族群研究。

根據上面九四年新黨支持者的例子，她（他）的投票行為效用界定為 $EU(V = Jaw \text{ or } \sim Jaw)$ ，而其政黨支持所衍生的「表達性」效用（expressive utility）界定為 NP ，所謂的「工具性」效用模型則界定為對兩個主流政黨候選人競爭性的評估，表現為 $Pc*(Uc-Uh)+Ph*(Uh-Uc)$ 。其中 Pc 代表陳水扁贏得選舉的機率或看好度，由個人對於候選人陳水扁的能力評估 Uc ，以及對於候選人黃大洲的能力評估 Uh ，兩者的相對比較 $(Uc-Uh)$ 所決定。在本文中的模型建立，作者認為選民對於候選人能力的評價，等同於預期該候選

人當選之後的施政表現，因此在選民進行理性自利的計算時，候選人的當選與否，對於選民的意義就是選民認為他能不能做好一個台北市長的工作，因此若某個候選人受到選民能力評價最高，選民會認為該候選人若當選，選民所獲的效用是最大的。因而本文將選民對於候選人能力的評價，做為選民用以計算的效用。而且個人對於陳水扁當選的效用感以 $Pc*(Uc-Uh)$ 來代表。同理這位新黨支持者對於黃大洲當選的效用感為 $Ph*(Uh-Uc)$ ，其中 Ph 代表黃大洲贏得選舉的機率或看好度。因此這位選民的投票決策模型可以建構為「表達性」與「工具性」兩種效用的加總，亦即：

$$EU(V= Jaw \text{ or } \sim Jaw) = NP + Pc*(Uc-Uh) + Ph*(Uh-Uc) \dots\dots\dots \text{(九四年模型)}$$

在這樣的投票決策結構下，當 $NP > Pc*(Uc-Uh) + Ph*(Uh-Uc)$ 時 $V = Jaw$ ，即新黨支持者投票給趙少康。相對的，當 $NP < Pc*(Uc-Uh) + Ph*(Uh-Uc)$ 時， $V = \sim Jaw$ ，即新黨支持者投票給趙少康之外的主流政黨候選人。因此我們有了一個 **binary choice** 模型，以「表達性」與「工具性」兩種效用的大小與增減來決定其政治支持的方向，然後根據這個效用模型來發展相符稱的統計模型。同理，一九九八年新黨支持者的效用模型可以表示為：

$$EU(V= Wang \text{ or } \sim Wang) = NP + Pc*(Uc-Um) + Pm*(Um-Uc) \dots\dots\dots \text{(九八年模型)}$$

其中行為者的投票效用界定為 $EU(V= Wang \text{ or } \sim Wang)$ ，而其政黨支持所衍生的「表達性」效用 (**expressive utility**) 為 NP ，「工具性」的效用模型中 Pc 代表陳水扁贏得選舉的機率或看好度，由個人對於候選人陳水扁的能力評估 Uc ，以及對於國民黨馬英九的能力評估 Um ，兩者的相對比較 ($Uc-Um$) 所決定。因此個人對於陳水扁當選的效用感以 $Pc*(Uc-Um)$ 來代表。在與九四年一致的投票決策結構下，當 $NP > Pc*(Uc-Um) + Pm*(Um-Uc)$

時，新黨支持者投票給王建。相對的，當 $NP < Pc*(Uc-Um)+Pm*(Um-Uc)$ 時， $V = \sim Wang$ ，即新黨支持者投票給王建之外的主流政黨候選人，如馬英九（參見表一）。透過九四與九八年兩個效用模型的建構，雖然影響投票決策的變項在不同的政治處境中有所不同，如候選人組合的差異，以及衍生的不同預期。但是基本的策略思考結構是一致的，除身份與認同外，主流政黨候選人的競爭性是決定第三黨支持者的投票移動方向。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在這樣的效用分類架構下，「自利」得以擺脫「自私」的糾纏，個人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因為「表達性」效用是重要的，認同的彰顯並不違反自利的原則。同樣的，理性的個人當然會從事策略性思考來彰顯其「自利」的維護，以及透過對於週遭環境變遷的預期來擴張其理性的內涵。更重要的是這樣模型的建立，能有一個基準來討論，是怎樣的思慮在影響個人的團體支持，進而分裂其選票，也就是可以界定在怎樣的條件下，個人會維持其團體的忠誠。例如在「表達性」效用大於「工具性」時，我們會觀察到一個堅定的（sincere）選民，反之，則是一個會思考的策略性（strategic）選民，而兩個相歧異的行為是在一個理性的架構下所產出的。

5.3 “少數” 策略性投票的統計模型

接著的問題是，如何在這個效用模型基礎上發展相符合的統計模型。根據上面的九四年模型，加以重組得到一個新的變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將兩位候選人的能力（ Uc 與 Uh ）視為影響第三黨選民的政治支持的效用考量（payoff），其係數的測量是被詮釋為代表兩位主流政黨候選人的相對「看好度」，即 $(Pc-Ph)$ 與 $(Ph-Pc)$ 。於是新的數學式組合如下⁵：

$$EU(V=Jaw \text{ or } \sim Jaw) = NP + (Pc-Ph) * Uc + (Ph-Pc) * Uh$$

……（九四年模型之二）

同理，九八年的效用模型可以重組為模型之二：

$$EU(V=Wang \text{ or } \sim Wang) = NP + (Pc - Pm) * Uc + (Pm - Pc) * Um \dots$$

----- (九八年模型之二)

以兩位主流候選人的能力 (Uc 與 Um) 視為影響新黨選民是否支持王建的效用考量 (payoff)，其係數的測量是被詮釋為代表陳水扁與馬英九的相對「看好度」，即 $(Pc - Pm)$ 與 $(Pm - Pc)$ ，而相應的 Probit 統計模型為：

$$Y(\text{Vote for } \sim \text{Jaw}=1, \text{Jaw}=0) = b_0 + b_1 * X(\text{Cheng's viability}) + b_2 * X(\text{Huang's Viability}) + e$$

----- [九四年]

$$Y(\text{Vote for } \sim \text{Wang}=1, \text{Wang}=0) = \beta_0 + \beta_1 * X(\text{Cheng's viability}) + \beta_2 * X(\text{Ma's Viability}) + e$$

----- [九八年]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迴歸分析所得的係數值 (coefficient values) 來討論在不同策略情境下“少數”選民的理性思維。進一步簡化上述的統計模型，表一對於選民政黨支持與選舉預期的分群，使我們可以集中討論新黨選民的行為。因為只分析新黨支持者的投票決策，模型之二中的「表達性」效用 (即 NP) 可以以截距值作代表，詮釋為新黨支持者團體忠誠的方向。而根據上面兩個效用模型 (Expected Utility Model) 來進行 Probit 分析，所得出的結果如表二及表三，表示新黨選民對於他黨候選人的評價，如何影響其策略性投票的機率。

因此接著的統計測量所要呈現的是，在認同與預期衝突的不確定情境下，主流政黨候選人陳水扁與黃大洲扮演不同的角色，來影響新黨選票的移動。如同上面團體行動模型中關於「少數選擇分流點」 k 值的討論，到達 k 值與否除了受同族群菁英競合的影響外，與主流政黨候選人的互動是另一個

5. 這個效用模型的原始構想來自於與 Chris Achen 的幾次討論，在此特別註明並感謝。

重要因素。九四年陳水扁的能力，對團結在趙少康旗下的新黨支持者並沒有顯著性的撼動效果，因為雖然預期陳水扁當選的新黨選民人數多，但在這一部分的選民中，大部分仍選擇新黨的趙少康（75.6%），其次為民進黨的陳水扁（21.1%），只有極少數願意選擇黃大洲（3.2%）。因此在表一中，雖然新黨支持者極少看好黃大洲，但看好黃大洲的新黨選民，卻較有可能棄趙少康投票給黃大洲。這兩個主流政黨推動 k 值的力量，其對於少數政治影響的方向與性質，符合前面圖一與圖二的類比與討論。

至於九八年的應用，表一中顯示新黨的支持者無人看好王建的當選可能性，這是與九四年情境最大的差別。至於投票決策的測量上，主流政黨候選人的能力評估的確會吸引新黨支持者的選票，但陳水扁對新黨支持者的作用同樣地不顯著，且呈減弱的趨勢。透過表二與表三中 Probit 迴歸模型係數值的比較，九八年的馬英九對新黨支持者的吸票能力，顯然高於九四年的黃大洲，表現為係數值的提升從 $0.89 (= Ph-Pc)$ 到 $1.39 (= Ph-Pc)$ 。透過模型中數學關係的詮釋，以陳水扁為基準，新黨支持者顯然極為看好馬英九的選舉前景，並因此而遠離新黨候選人王建。相對地，陳水扁對新黨選民的影響力則不但不顯著且在力道上有改變，表現為係數值的變化從 $1.05 (= Pc-Ph)$ 到 $0.39 (= Pc-Pm)$ ，代表民進黨對於轉移新黨支持者的影響力，明顯地受制於國民黨的提名策略。

根據表二及表三的數據進一步分析，圖五-圖八所模擬（King, Tomz, Wittenberg, 2000）的是，若新黨選民對於非新黨候選人的能力評價有所改變時，是否會影響其策略投票的機率。運用 stata 統計軟體進行模擬，X 軸的 1-7 代表選民對於候選人能力評價的高低，數值越高表示評價越高，而在 Probit 模型分析之後，進一步進行模擬運算，將選民對於候選人能力的評價設定為 0（x 軸上之數值為 1）、0.2（x 軸上之數值為 2）、0.4（x 軸上之數值為 3）、0.6（x 軸上之數值為 4）、0.8（x 軸上之數值為 5）及 1（x 軸上之數值為 6），分別計算候選人所受到的不同能力評價對於新黨選民支持其他政黨的候選人機率有何影響，由於本文一次僅針對一位候選人的能力評價進行模擬，因此

另一位候選人的能力評價以「平均數」進行控制；而 Y 軸顯示了新黨選民投票給其他政黨候選人的機率，也就是「移轉性投票機

表二、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新黨選民的策略投票決策

策略性投票	
(Probit 模型中的依變數, 不投票給趙=1, 投票給趙=0)	
新黨選民對陳能力的評價(b_1)	1.05 (0.76)
新黨選民對黃能力的評價(b_2)	0.89* (.32)
截距值	-2.08* (0.71)
新黨選民個數	204

附註：資料來自胡佛所領導之「政治體系與變遷工作室」。

1. **新黨選民對陳能力的評價(b_1)**：陳水扁的能力怎樣？答“很強”登錄為 1，答“尚可”登錄為 .75，答“稍差”登錄為 .25，答“很差”登錄為 0。（九四年問卷）
2. **新黨選民對黃能力的評價(b_2)**：黃大洲的能力怎樣？答“很強”登錄為 1，答“尚可”登錄為 .75，答“稍差”登錄為 .25，答“很差”登錄為 0。（九四年問卷）
3. 表中的**新黨選民個數**，為市議員選舉認同新黨，在市長選舉中的「趙少康支持者」及「非趙少康支持者」，因此「非趙少康支持者」中除了支持其他候選人以外，還包括市議員選舉支持新黨，但在市長選舉中為投票或棄權者。

率」。需說明的是，以圖五為例，當「對於陳水扁評價最低時，仍選擇支持其他政黨」的新黨選民，基本上已經是將選票移轉給其他政黨的新黨選民了（約為 0.08 左右）；以 0.08 為基準，而隨著「對陳水扁能力評價的提高，才進而增加對其他政黨候選人支持」的這一部分的增加的機率，就是所謂的「策略性投票」的機率。需說明的是，94 年與 98 年對於選民對候選人能力評價的測量基本上是運用不同的方式—94 年是測量選民對於候選人能力強弱的評價，由「很強」、「尚可」、「稍差」、「很差」四個等級分別登錄為「1」、「0.75」、「0.25」及「0」；而 98 年的測量方法是讓選民將候選人依據其能力高低進行排名，由「第一」、「第二」、「第三」三個等級分

表三、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長選舉新黨選民的策略投票決策

策略性投票 (Probit 模型中依變數, 不投票給王=1, 投票給王=0)	
新黨選民對陳能力的評價(β_1)	.39 (.39)
新黨選民對馬能力的評價(β_2)	1.39* (.40)
截距值	.37 (.36)
新黨選民個數	176

附註：資料來自胡佛所領導之「政治體系與變遷工作室」。

1. 新黨選民對陳能力的評價(β_1)：在能力方面，您覺得誰最好？答陳水扁第一登錄為 1，答陳水扁第二登錄為 .5，答陳水扁第三登錄為 .0，拒答或不知道登錄為 .5。（九八年問卷）
2. 新黨選民對馬能力的評價(β_2)：在能力方面，您覺得誰最好？答馬英九第一登錄為 1，答馬英九第二登錄為 .5，答馬英九第三登錄為 .0，拒答或不知道登錄為 .5。（九八年問卷）
3. 表中的**新黨選民個數**，為市議員選舉認同新黨，在市長選舉中的「趙少康支持者」及「非趙少康支持者」，因此「非趙少康支持者」中除了支持其他候選人以外，還包括市議員選舉支持新黨，但在市長選舉中為投票或棄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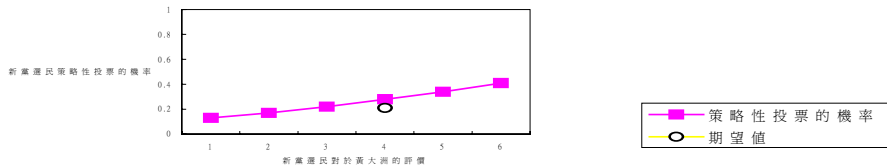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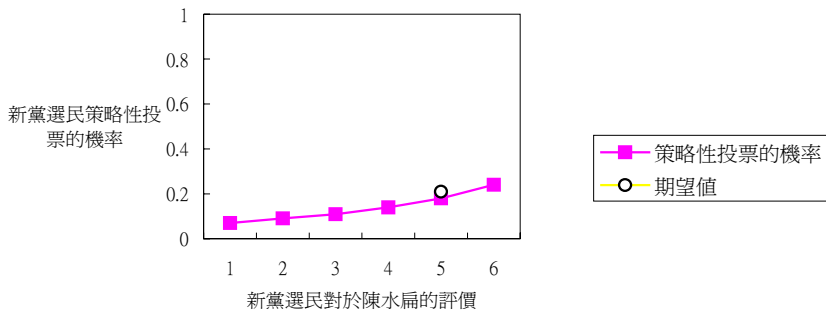
別登錄為「1」、「0.5」及「0」。由於本文所運的資料來自胡佛所領導之「政治體系與變遷工作室」，因此對於候選人能力的不同測量方式實為資料妥協的結果。

根據表二的數據，圖五及圖六所模擬的是，在 94 年台北市長選舉時，新黨選民對於陳水扁及黃大洲評價的高低，影響其移轉性投票機率的程度為何。在圖五及圖六中，顯示新黨選民對於非新黨候選人能力評價越高，進行策略性投票的機率也越高。然而，比較圖五及圖六，發現當新黨選民對陳水扁能力評價最高時，其投票給其他政黨的機率也僅於 0.2 左右，而圖六中，新黨選民對於黃大洲評價最高時，投票給其他政黨的機率達 0.5 左右，顯然

新黨選民對於國民黨候選人能力的評價，較能夠影響新黨選民的策略性投票。

圖五、94年台北市長新黨選民對陳水扁能力的評價以及策略性投票

圖五 94年台北市長新黨選民對陳水扁能力的評價以及策略性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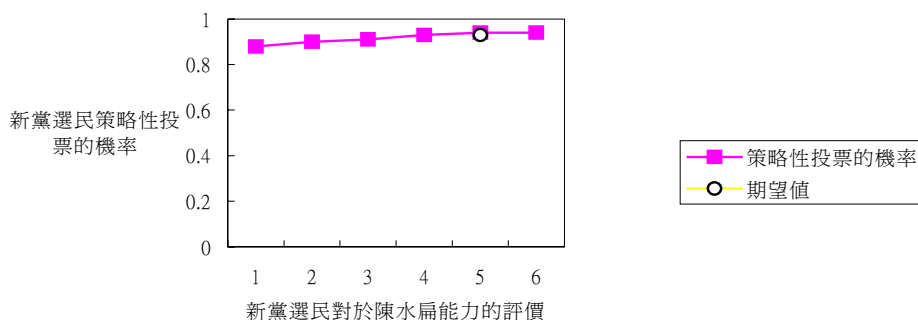
圖六、新黨選民對於黃大洲的評價與策略性投票

需說明的是，圖中的「期望值 (expected value)」，為當兩位他黨候選人在新黨選民心目中的能力評價都控制於「平均值」時，新黨選民策略性投票的機率為何，由於兩位他黨候選人在新黨選民心目中的能力評價都控制於「平均值」，這在一般統計詮釋的意義在於代表性，也就是期望值代表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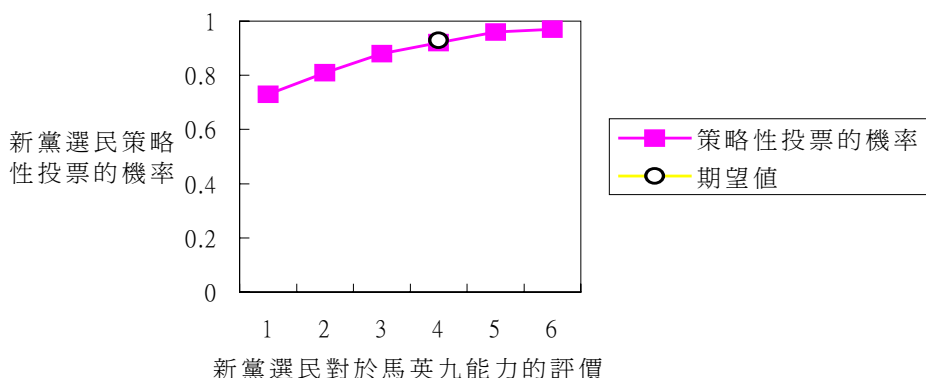
在當次調查資料中一般新黨選民的行為趨向，在此用以與模擬的趨勢做比較。

根據表三的數據，圖七及圖八模擬的是，在 94 年台北市長選舉時，新黨選民對於陳水扁及馬英九評價的高低，影響其策略投票機率的程度為何。

圖七、98 年台北市長選舉新黨選民對於陳水扁能力的評價與策略性投票



圖八、98 年台北市長選舉新黨選民對於馬英九能力評價與策略性投票



98年與94年選舉不同的情況是，98年新黨選民的移轉性投票機率普遍較94年高。以對陳水扁的能力評價而言，在94及98同樣的評價分數之下，新黨選民於94年不到2成的移轉性投票機率，到98年居然為8成以上。另一方面，比較圖七及圖八，顯然新黨選民對於陳水扁的能力評價高低，影響其策略性投票的機率變化較少，顯示新黨選民對於陳水扁的評價較不易影響投票給其他政黨候選人的機率；而圖八中，新黨選民對馬英九的評價越高，考量策略性投票的機率變化比圖七要來的多，顯然新黨選民對於馬英九的能力評價，相當程度會影響其是否投票給他黨候選人的考慮。因此不論94年及98年，在新黨選民投票考量上，國民黨候選人都比民進黨候選人有較大的影響力，是符合前面所討論的兩黨候選人動向，對於少數選票的策略選擇空間上，所形成的不同結構，進而影響少數選票的流動。

六、結論—「身份」政治的議程

本文透過個人理性行動在團體政治中的討論，來重新分析“少數”政治行為的架構，並根據簡單的假設來建立命題以觀察長期的趨勢，搜尋變遷的機制，與界定短期調整的行為。從這段描述可以有一個清晰的印象，少數政治的「身份」面向是個人與團體互動中一個均衡的達成，並非恆常不移的。圖一與圖二中兩個均衡點的競爭，就一直在提示動態均衡中，變遷的動力是存在的，而其基礎是個人感性與理性兼俱的動機。在這樣的理解架構下，「身份」政治祇是解釋了選民投票決策中「感性」的一面，而一個適當的理解模型必須預示變遷的可能。

在這樣的理論要求下，圖一與圖二所描述的團體行動提供了一個一致且具比較意義的架構，來解釋現實政治中台灣三黨結構的性質，特別是其中第三黨的族群性格，以及其與兩個主流政黨互動的結構。**簡單的結論是：在主流政黨候選人缺乏勝算的情形下，新黨的支持者是鞏固在新黨政治菁英的旗下；反之，在主流政黨的政策調整與外省菁英的推出下，新黨的支持者是移**

出的。這樣的流動性格很難說是反映社會分歧的新興政治力量，可推論是主流政黨的「疏離選民」。在這個分析脈絡下，新黨的政治基礎並非純粹「反李」或是反動的歷史殘餘，而是在危機意識下（徐永明、范雲，1994），一個群眾尋求政治領導與表達不滿的過程。因此，當主流政黨間的同質性高，均推出本省籍的候選人，而少數族群菁英團結的九四年選舉，新黨的選民也是團結的支持新黨的外省籍菁英。有趣的對比是九八年國民黨的調整，以外省菁英吸納外省選票，因而新黨的選民也是團結的，只不過是團結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透過這個比較的架構，我們或許可以藉之來預測未來不同的策略情境下，新黨支持者的集結與移動，是依附於其他主流政黨中的外省菁英的角色。

在這些分析討論的過程中，一個理性個人的認同旨趣（interest）得以彰顯，個人的策略模型透過理性預期而得以與團體行動連結，這時候的「自利」不單是「自私」，或是短視的計算。在不確定的政治環境下，「自利」是一個複雜的、預期的、受他人與團體行動影響而形成最適決策的過程。或許一個個人在缺陷的民主設計中，其最高的美德在展現其對理性決策的達成。這其間菁英與群眾的互動是一個相互「說服」與辯論的過程，群眾透過政治支持的轉移來「懲罰」主流菁英的政策，同樣的也透過選票的回歸來獎勵其調整。簡言之，主流菁英與少數族群間不斷的相互「以牙還牙」（tit-for-tat），或許才是近來台灣政黨體系演變的背後動力。這其中，如表二、三中陳水扁影響力不顯著所隱喻的危機是 -- 民進黨在與外省族群互動的過程中，相較於國民黨，民進黨所能扮演的角色相當有限，且從九四-九八年來看，並沒有改善的跡象，而是不斷拘泥於本省族群的動員及與外省族群的敵意當中。

本文雖奢言要建構一個少數族群的政治模型，但基本上是想理解台灣選舉競爭中，少數族群在政治支持上團結與移動的動機，並討論其與主流團體或多數族群間的互動。如果以上的模型建構、命題發展、與實證討論是妥當的，這篇論文對於台灣多黨體制發展的隱喻是，當外省群體清楚地團結在主流政黨以外的政治領袖時（如宋楚瑜），主流政黨內的外省菁英已是居於

弱勢的地位。在這樣的情境下，少數政治並不如一般的預期會在族群日常生活的融合過程中消退，反而是因族群政治領袖的分合，而形成顯著的政治動員。反應於兩千年總統選舉的結果，宋楚瑜與陳水扁相差無幾的得票率即可反應，身為外省菁英的宋楚瑜，有效的吸納了外省選票，甚至於泛國民黨選票，其選舉結果有如九四年的台北市長。在另一方面，當少數族群團結的菁英對象並不為主流政黨所接受時，爭取多數族群的團結就會成為主流政黨選舉動員的重要選項，也就是本省族群的動員將成為兩大主流黨的競選主軸。因此，兩千年的總統大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場所（setting），以觀察「少數政治」的團結對於「多數族群」政治支持的衝擊作用，是眾所預言的「棄保效應」，還是「多數政治」的渙散。而很明顯的，兩千年總統選舉的國民黨和宋楚瑜，正式呈現了少數菁英與主流政黨拉鋸的過程，作為一有效的族群動員，宋楚瑜是成功的，因為其掌握了少數族群的團結，而國民黨顯然並未掌握好主流政黨的角色，因此放任外省族群團結的情況下，只好與民進黨瓜分本省族群的選票，但加上首長選舉的政治明星效應之後，國民黨的連戰有如九四年的黃大洲，既未掌握外省族群，又未能有效吸納本省族群，而陳水扁就在兩次相似的政治情境之下，拿下了首長選舉的寶座。

參考書目

- Chu, Yun-han, and Tse-min Lin. 1996.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aiwan: Social Cleavage,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Emerging Party System." in Hung-mao Tien. 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ve*. Armonk, NY: M.E. Sharp.
- Chen, Tun-jen, and Yung-ming Hsu. 1996. "Issue Structure, the DPP's Factionalism, and Party Realignment." in Hung-mao Tien, 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ve*. NY: M.E. Sharp.
- Chong, Dennis. 1991.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King, Gary and Tomz, Michael and Wittenberg, Jason. 2000. "Making the Most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Improving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4: 341-355.

Laitin, David D. 1995. "Marginality: A Microperspective."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7: 31-57.

Olson, Mancur, J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senstone, Steven, and Roy Behr. 1996. *Third Parties in America: Citizen Response to Major Party Fail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elling, Thomas C. 1978.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NY: W.W. Norton Press.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69.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I. NY: Anchor Books.

王甫昌。1993。〈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42-100。台北：業強出版社。

——。1998〈台灣族群政治的形成與表現：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選舉結果之分析〉。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主編《民主、轉型？台灣現象》：143-232。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吳乃德。1993。〈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張茂桂編《族群關係和國家認同》。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1996。〈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刊》1：5-40。

吳乃德、沈筱綺。1998。〈外省人的認同：台灣民族形成的兩種路徑〉。「全球化的挑戰與台灣社會」研討會，東吳大學。台北，4月16-17日。

徐永明、范雲。1994。〈外省人危機意識與其政治表現〉。『認同與追尋：

- 「外省人」在臺灣』研討會，外獨會與福爾摩沙基金會主辦。
- 。1998。〈學做台灣人：理性預期與台灣認同政治發展的路徑〉。台灣政治學會第五屆年會。台北：東吳大學。
- 張茂桂。1997。〈談『身份認同政治』的幾個問題〉。游盈隆編《民主鞏固或崩潰》：91-116。台北：月旦出版社。

A Tale of Two Cities (1994 and 1998): Mass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Yung-Ming Hsu*

Why do minority voters like to make political group commitment, and what effect does elite characteristics have on their choices under political uncertainty? Very little empirical research trie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n a systematic way. This article examines patterns of minority politics and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 of mass choice. I find that the elite's characteristics help minority voters make coordinated choice to signal their voices. I reach these conclusions by specifying and testing an individual-level model of minority choice, using as dependent variable the probability that New Party voters will vote for their candidates in 1994 and 1998 Taipei Mayoral Elections.

Keywords: strategic voting, ethnic politics, political uncertainty, collective choic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